



A Review of Forty-Year Research on Tongshan Dialect Research **通山方言研究的四十年学术史述评**

Haiyan Wu^{1*}; Shuang Zhang²

¹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China

²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bei, China

E-mail: 470046501@qq.com; shuangzhang@hbut.edu.cn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19 published papers on Tongshan dialect from 1979 to 2021, offer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publication timeline, key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research themes and hot topics, academic context and trends, existing issues, and prospec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ongshan dialect research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initial descriptions as part of regional dialects to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and finely studied subject. Its research focus remains firmly grounded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with abundant achievements in phonetic descrip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analysis. Grammar studies concentrate on distinctive sentence structures, while lexical and pragmatic research remains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eek breakthroughs in expanding geographical coverage, deepening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conducting comparative studies that integrat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pproaches, 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enhancing language resource preservation, thereby advancing the field toward more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Keywords: research review; southeastern hubei dialects; tongshan dialect

引言

2012 年，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7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些文件均将语言资源保护视为国家战略。方言作为地方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其保存与研究成为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一环(国务院，2017；教育部，2012)。近年来，“汉语方言学”在语言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也更加巩固。例如，教育部最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汉语言文字学”二级学科，以及“语言学”一级学科(交叉学科门类)的设置，均为方言学研究提供了稳固的学科归属和人才培养通道(国务院，2022)。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方言研究相关课题(如濒危方言记录、方言语法比较、方言接触研究等)的立项数量和资助力度显著增加，尤其鼓励面向中西部、交界地带等薄弱区域的调查。

通山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其方言在语言学分类上通常被划归为赣语大通片(编写组，2012)，但因长期处于赣语、湘语、江淮官话及西南官话等多方言区的接触与过渡地带，形成了极其复杂而富有特色的语言面貌(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这种“交界性”与“过渡性”使得通山方言如同一座语言学的“富矿”，既保留了古汉语的诸多层次，又叠置了不同方言接触影响的痕迹，对研究汉语方言演变、方言接触机制及方言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王洪君，2009)。

然而，与吴语、粤语、闽语等大方言区相比，对通山方言这样的小片方言进行系统、深入的学术关注起步较晚(曹志耘，2015)。本文旨在通过对四十多年来(1979-2021)具有代表性的19篇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与评述，勾勒通山方言研究的学术发展轨迹，总结已取得的主要成就与核心观点，剖析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例如，通山方言因其独特的“交界性”与“过渡性”，能为方言接触的音变模型(陈保亚，1996)、语法特征的区域扩散、濒危方言的演变机制等语言学议题提供关键案例(张振兴，2013)，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清晰的学术史参照和切实的路径启发。

文献选取与分析

本文文献选取采用计算机检索和手工排查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 CNKI 期刊网，检索在 1979-2021 年间出版的、主题中含有“通山方言”、“鄂东南方言”、“鄂南方言”、“阳新方言”等字样的论文。从这些主题入手进行文献检索，能尽可能的覆盖通山方言研究有关文献，且能最大限度地确保文献检索的范围。然后采用手工排查的方法，剔除与通山方言研究无关的论文。通过这种方式共选取 19 篇有关通山方言研究的论文，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对某个话题从发文量、核心作者与机构、研究主题与热点、研究脉络演进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梳理，是开展文献综述或学术史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李杰，陈超美，2017)。这种梳理并非简单的文献资料堆砌，而是一种结构化的学术分析，其必要性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历年发文量有助于呈现某个话题的学术生命力和发展周期，核心作者与机构可以揭示学术共同体，研究主题与热点可以体现某个话题的核心内容、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而研究脉络演进则可以洞察发展逻辑，预测未来方向。有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从历年发文量、核心作者与主要研究机构、研究主题、热点与主要观点、研究趋势与脉络演进等方面对所选取的 19 篇论文进行分析。

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选取的 19 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这 19 篇文献的具体题目详见文末参考文献，具体涉及以下作者：陈有恒(1979)、陈有恒, 刘兴策(1986)、范新干, 梁洁(2016)、范新干(2003, 2004, 2007, 2008)、甘紫丹 (2013)、华娇(2011)、黄群建(1990, 1997)、李佳(2010)、石桂芳(2008a, 2008b)、王宏佳(2007, 2019)、张少云(2021)、张勇生(2011)、郑婷(2015)。我们将近 40 年来通山方言研究的整体情况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通山方言研究的四十年整体情况

阶段	发文量	核心作者	主要研究机构
1979-1989 年代	2	陈有恒	湖北科技学院
1990-1999 年代	2	黄群建	湖北师范大学
2000-2009 年代	7	范新干、王宏佳、石桂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年代至今	8	李佳、张勇生、范新干等、 华娇、甘紫丹、王宏佳、郑婷、张少云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科技学院等

历年发文量分析：从零星初探到持续关注

通过表 1 对 19 篇文献的出版时间进行统计，可以清晰看出通山方言研究学术关注度的演变历程：

1979-1989 年代是奠基与附庸期，这一时期共发文 2 篇。以陈有恒（1979，1986）的研究为代表，其特点是将通山方言置于“鄂东南方言”这一更大的区域框架内进行观察和描述。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明确了通山方言作为鄂东南方言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并初步探讨了其内部分歧与外部联系，但尚未对通山方言本身进行独立、精细的解剖。

1990-1999 年代是通山方言研究的沉寂与转向期，本阶段仅发文 2 篇，均为黄群建先生对通山及邻近阳新方言的语音研究。这一阶段发文量少，但研究视角开始从宏观区域转向更具体的方言点（通山、阳新），并从一般的特征描述深入到特定音类（古牙喉音、泥母）历史演变的探讨，显示了研究深化的苗头。

2000-2009 年代为兴起与深化期，这一时期共发文 7 篇，是研究成果集中涌现的十年。范新干（2003，2004，2007，2008）成为该阶段的核心研究者，其研究覆盖了通山方言的被动句、动词句、语素变调、历史层次等多个层面，标志着通山方言研究进入了以具体方言点为核心、语言本体各子系统（尤其是语法和音韵）得到全面关注的深化阶段。同时，出现了首批以通山方言为专题的学位论文（王宏佳，2007；石桂芳，2008a），表明其已进入高校语言学专业系统研究的视野。

2010 年代至今是通山方言研究的持续与拓展期，本时期内共发文 8 篇。研究主题在延续音韵（李佳，2010；张勇生，2011；范新干、梁洁，2016）、语法（华娇，2011）微观研究的同时，出现了两次重要的“回头看”式综述（甘紫丹，2013；王宏佳，2019），以及更具比较视野的区域音韵研究（郑婷，2015）和词汇专题研究（张少云，2021）。这表明学界在积累大量个案研究后，开始进行阶段性总结，并尝试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和更多的语言子系统（如词汇）中定位通山方言。

总体而言，通山方言研究呈现出发文量从稀少到增多、研究从宏观附属到微观独立、从单一语音到多点开花的渐进发展态势。2007 年前后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此后研究进入活跃期。

核心作者与主要研究机构

核心作者群

通山方言研究领域已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但规模较小的核心研究队伍。具有代表性的有范新干、陈有恒、黄群建、王宏佳等。其中，范新干无疑是成果最丰硕、研究最持续的作者，共发表 5 篇论文（2003，2004，2007，2008，2016）。其研究集中于通山方言（尤其是南林话）的语法特色句式和历史音韵，方法细腻、考证严谨，极大地推动了通山方言研究的纵深发展。其次是陈有恒与黄群建。作为早期研究者，为鄂东南及通山方言研究奠定了基础。陈有恒勾勒了区域轮廓，黄群建则开启了点上的深入音韵分析。还有王宏佳，其博士学位论文（2007）是对咸宁方言词汇的系统研究，虽非专攻通山，但为理解包括通山在内的鄂东南方言词汇面貌提供了重要参考，其后的综述（2019）也具有学术史价值。此外，另有石桂芳（2008b）、张勇生（2011）、华娇（2011）等代表了中生代和新生代的研究力量，分别在代词、声母、虚词用法等方面做出了专题性贡献。

主要研究机构

华中师范大学是当之无愧的研究重镇。多位重要作者如范新干、王宏佳、石桂芳均与该校有密切关系，或在其中就读，或在其中任职，或者与该校有合作。其语言学学科的雄厚实力为通山方言研究提供了持续的人才和学术支持。另有湖北本地高校如湖北师范大学（原湖北师范学院）、湖北科技学院等，凭借地缘优势，成为开展本土方言调查与研究的重要基地。由此可见，通山方言研究形成了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主要学术策源地，联合湖北本地高校研究者共同推进的格局，体现了高校对方言研究的主导作用。

研究主题与热点

语音研究

语音研究是通山方言研究中成果最集中、讨论最深入的领域，共有 10 篇文献涉足，核心热点包括：第一，历史音韵层次与演变。这是语音研究的核心。学者们致力于厘清通山方言中古音系的留存与演变规律。例如，黄群建（1990，1997）较早揭示了通山、阳新方言中古牙喉音、泥母字读音的特殊性及其对韵母的影响。范新干（2008）敏锐地捕捉到通山南林话将中古开口一等韵读为齐齿呼这一罕见现象，并进行了细致考证。李佳（2010）将视野扩大到鄂东南，通过蟹、假、果摄主要元音的今读探讨区域共性及内部差异。张勇生（2011）则系统分析了通山方言古全浊声母清化后的今读类型，明确了其“平仄分送”等关键特征。范新干与梁洁（2016）的“本字考”工作，进一步从词汇角度印证了其音韵特点。其次，共时音系与特殊音变。在共时描写方面，陈有恒（1979）进行了早期特征概括。范新干（2007）专门研究了通山方言的“语素变调”，揭示了连读中复杂的变调行为，这是对单字音系的重要补充。

通山方言语音研究已基本勾勒出其音系轮廓，并在历史层次分析上取得显著进展。共识在于，通山方言保存了丰富的古音特征（如全浊声母演变类型、韵母分合），同时受周边方言影响产生了一些创新或混杂形式，体现了其作为“方言过渡区”的典型特征。

语法研究

语法研究虽篇目不多（6 篇），但针对性极强，形成了明确的热点。首先是“把得”句研究，范新干（2003，2004）的两篇论文是这一专题的奠基之作。他详细区分了“把得”作为被动标记的被动句和作为“给予”义动词的主动句两种句式，分析了其结构、语义和语用特点，指出“把得”被动句可能源于其“给予”义，是方言语法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其次，虚词“得”的用法。华娇（2011）对通山方言中“得”的多种语法功能（如可能补语标记、结构助词等）进行了梳理，展现了该虚词在方言中的多功能性。还有代词系统研究。石桂芳（2008a，2008b）对通山方言的人称代词乃至代词系统进行了专题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空白。

语法研究揭示了通山方言一些不同于普通话乃至周边方言的独特语法面貌，如“把得”句式的双重功能，显示了语法研究在彰显方言个性方面的巨大潜力。但目前研究仍集中于少数几个显性的“特色”项目，系统性有待加强。

词汇与其他研究

词汇研究相对最为薄弱。王宏佳（2007）对咸宁词汇的研究是重要参考，但非通山专论。张少云（2021）对咸宁亲属称谓的研究是近期一个可喜的专题尝试。通山方言本体的词汇系统、特色词、词源考证等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还有新起的综述与

比较研究。甘紫丹(2013)和王宏佳(2019)的综述文章,为把握鄂东南及通山方言研究全貌提供了便利。郑婷(2015)的跨省交界区域音韵比较,则将通山方言置于皖鄂赣交界的大背景下,开启了更具类型学视野的研究路径。

研究趋势与脉络演进

纵观四十余年的发展,通山方言研究呈现出清晰的学术演进脉络:

1)从区域性附庸到方言本体的独立聚焦。早期研究多将其置于“鄂东南方言”等宏观区域框架内进行附属性概貌描述。随着研究深入,学界逐渐确立了“通山方言”乃至其下位变体(如“南林话”)作为独立语言系统的研究价值,实现了从区域背景中剥离,转向对单一方言点内部结构与特征的精细化描写与刻画。

2)从共时平面描写到历时演变探索。研究初期以共时层面的语音特征归纳与罗列为主。其后,学术重心迅速转向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着力追溯其中古音系来源、剖析音韵层次叠置、阐释例外音变现象。历时视角不仅成为主导性分析框架,亦使该方言成为观照汉语历史音韵演变的重要微观案例。

3)从语音本体主导到语法词汇的系统性垦拓。研究领域长期集中于语音学,呈现“语音独大”的格局。近年来的进展显著突破了此局限,语法学与词汇学相继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尽管各子系统研究深度尚存差异,但整体上已呈现出从单一维度向语音、语法、词汇多元维度并进的研究态势,标志着学科内部结构的日趋均衡与完整。

4)从单点孤立分析到区域类型比较。学术视野经历了空间层级的不断扩展。早期研究多局限于通山单点。随后,比较视野首先延伸至咸宁、阳新等鄂东南方言内部,以辨析内部分歧与联系;进而拓展至安徽、江西等邻省交界区域方言,开展跨省域的比较音韵研究。这一进程推动了方言地理学意识的自觉与应用,致力于在更广阔的空间关系中定位其类型学特征。

5)从传统描写基底到多理论视角的综合阐释。在继承并夯实田野调查与结构主义描写这一传统根基的同时,部分前沿研究开始自觉地吸纳、融合多种现代语言学理论框架进行解释性研究。例如,运用语法化理论阐释“把得”句式的来源与演化,借助语言接触理论分析交界地带的特征交融现象。此举标志着该领域从注重事实描述的“规定性”研究,向追求理论解释与建构的“解释性”研究范式转型,理论自觉性与对话能力显著提升。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通山方言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力量相对单薄,覆盖不均:核心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多集中在通山个别代表点(如县城、南林),对境内其他乡镇方言的调查严重不足,无法全面反映通山方言的内部差异。其次,研究主题不平衡。语音研究“一枝独秀”,语法研究集中于少数热点,词汇研究则近乎“荒漠”。语言本体的语义、语用研究,以及方言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基本空白。再次,理论深度与解释力有待加强。多数研究仍以精细描写和事实呈现为主,虽然宝贵,但上升到理论概括、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如实验语音学、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等)进行深度解释的研究还非常欠缺。

此外,动态研究与资源保护意识薄弱。现有研究几乎全是共时静态描写,缺乏对通山方言在城镇化、普通话推广背景下快速变化过程的追踪研究。对方言作为濒危文化资源的抢救性记录、数字化保存和活化利用关注不足。最后,材料公开与共享不足。除已发表的论文外,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如音档、词汇数据库、语料库)未得到系统整理和公开,不利于学术积累和后续研究的验证与深化。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与建议

基于以上梳理和问题分析,对未来通山方言研究尝试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拓展调查广度,绘制语言地图。亟需开展通山县域的方言普查,建立覆盖各乡镇的方言数据库。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制精细的语言特征分布图,清晰展示其内部差异,为研究方言接触与扩散提供坚实基础。

其次,深化研究维度,实现系统均衡。语法研究层面,在现有特色句式研究基础上,应系统考察词类、句法结构等,构建相对完整的语法系统描述。词汇研究层面,启动系统性的词汇调查,编纂《通山方言分类词汇表》或词典,加强特色词、古语词、底层词的研究。语义与语用研究层面,开展方言概念域、话语标记、言语行为等研究。

第三,强化理论引领,推动学科对话。积极引入语言接触理论、语法化理论、语言变异与变化理论、实验语音学等方法,不仅要回答“是什么”,更要探讨“为什么”和“如何演变”,提升研究的理论贡献。加强与汉语史等研究的对话,探讨底层或接触问题。

最后,积极开展历时追踪,关注语言生活。采取“方言监测点”等形式,对老、中、青不同代际方言发声人的语言能力、语言态度、语言使用进行社会语言学调查,记录方言的共时变异和历时变化过程,为语言政策制定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结语

通山方言研究经过四十余年的积累,已经从区域方言研究的边缘地带,成长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和相当深度的学术领域。几代学者筚路蓝缕,在语音、语法等方面取得了扎实而富有洞见的成果,初步揭示了这座“方言博物馆”的珍贵价值。然而,站在新的学术起点上,研究的不平衡性、理论的滞后性以及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等问题也日益凸显。未来的研究,需要在继承传统描写语言学严谨学风的基础上,大力拓展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维度,积极拥抱新的理论和方法,关注活态的语言生活,从而使通山方言研究不仅能为汉语方言学、历史语言学贡献更多独特的案例,也能在保护语言多样性、传承地方文化方面发挥切实的作用。从“冷门绝学”到“活力领域”,通山方言研究仍有漫长而充满希望的道路要走。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鄂南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语言接触视角下的通山方言词汇代际差异研究”(编号:2024XZE13)。

参考文献

- 编写组.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2.
- 曹志耘.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定位、目标与任务[J].语言文字应用,2015,(4), 2-9.
- 陈保亚.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M].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6.
- 陈有恒.鄂东南方言的特征[J].教学参考,1979(2),30-39.
- 陈有恒,刘兴策.鄂东南方言的内部分歧与外部联系[J].咸宁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100-110.
- 范新干,梁洁.鄂东南通山方言一组本字及其音韵特点[J].华中学术,2016,8(4),197-202.

- 范新干. 湖北通山方言的“把得”被动句[A]. 汉语被动表述问题研究新拓展——汉语被动表述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2003, 115-118.
- 范新干. 湖北通山方言的动词“把得”句 [A].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第二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2004, 114-117.
- 范新干. 湖北通山方言的语素变调[J]. 方言, 2007(2), 116-118.
- 范新干. 通山南林话读中古开口一等韵为齐齿韵的考察[J]. 古汉语研究, 2008(2), 19-21.
- 甘紫丹. 鄂南方言研究综述[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6(11), 75-77.
- 国务院.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 2017, 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2025年12月29日]
- 国务院.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EB/OL]. 2022, <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2025年12月29日]
-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省志民俗方言[M].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 华娇. 通山方言中“得”的几种用法[J]. 文教资料, 2011(8), 20-21.
- 黄群建. 通山方言的语音特征[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4), 91-97.
- 黄群建. 阳新方言古牙喉音及泥母对韵母的影响[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17(5), 89-92.
- 李佳. 鄂东南方言蟹假果摄的主要元音及相关问题[J]. 方言, 2010(2), 156-164.
- 李杰, 陈超美. 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第二版)[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7.
- 教育部.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EB/OL]. 2012,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8/s3127/s7072/201212/t20121210_146511.html [2025年12月29日]
- 石桂芳. 通山方言的代词[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a.
- 石桂芳. 通山方言的人称代词[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b(7), 47-48.
- 王宏佳. 鄂东南方言研究综述[J]. 华中学术, 2019, 11(1), 222-231.
- 王宏佳. 湖北咸宁方言词汇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王洪君. 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9.
- 张振兴.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和汉语方言学[J]. 中国方言学报, 2013, (3), 1-10.
- 张少云. 咸宁方言亲属称谓研究[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21, 41(2), 60-64.
- 张勇生. 鄂南通山方言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类型[J]. 语言研究, 2011, 31(4), 115-120.
- 郑婷. 皖、鄂、赣交界区域三片方言的音韵比较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